

近代西欧经济重心转移溯源

罗翠芳

(江汉大学 城市研究所, 湖北 江汉 430056)

摘要: 中世纪西欧经济重心一直在地中海区域,然而在近代却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西欧经济重心的这种转移,是伴随着地中海经济相对衰落与大西洋沿岸经济兴起而发生的。16世纪下半期,地中海区域占主导地位的大商人资本从贸易和生产上撤资,掀起了金融投机狂潮。而同一时期西北欧商人商船出现了南下地中海的热潮,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控制了西欧国际转运贸易与国际货币支付体系,最后把西欧经济重心由热那亚和威尼斯推向大西洋沿岸。

关键词: 重心转移; 转运贸易; 支付体系

中图分类号: K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1-0097-05

On the Transferring of the Economic Center of Western Europe in the 16-17th Centuries

LUO Cui-fang

(Institute of city, Jiangnan University, Hanjiang 430056,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center of Western Europe had always been in the Mediterranean since the Middle Ages. However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it had changed. In the process,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had fallen off, but the Atlantic Ocean littoral economy had risen. At the same time the big businessman capital in the Mediterranean addicted to the financial speculation, but the newly businessman capital in the northwest Europe went down to the Mediterranean, gradually controll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trade of Western Europe, and had pushed the economic center toward the Atlantic Ocean littoral at last.

Key Words: center transferring; the transport trade; pay system

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因得地理之便,处在东西方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靠转运东西方商品而逐渐积累资本,成为欧洲先富起来的一批城市群,是欧洲经济世界的核心与主角。而位于欧洲大西洋沿岸还未真正形成民族国家的英国、荷兰等,当时还处在地中海经济体的外围。因此地中海区域是那一时期的经济重心。

然而近代以来,西欧经济重心却出现了转移:从地中海北移至大西洋沿岸。这种转移在史学界早有定论,毋庸置疑。然而这种转移具体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其转移的主要内容和标志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就这些问题学术界还没有专题研究出现。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近代商业资本在西欧范围内国际流动入手,以地中海区域相对衰落与大西洋沿岸兴起为主要内容,以国际转运贸易主动权和国际货

币支付体系主导权的变换作为经济重心转移的主要标志,来回溯这种具体的转移源流,以及这种转移对西欧近代历史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一、从安特卫普到热那亚:地中海的时代

16世纪上半期大西洋沿岸的安特卫普繁荣起来,成为南北经济的交汇点,大量的商业资本向安特卫普流动,于是有人认为西欧经济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果真如此吗?

西欧商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认为: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种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这种界定,本文有时把商人资本与商业资本互用)流向安特卫普,并不是安特卫普自身有着坚实的工商业基础。安特卫普繁荣是外地商业资本流入而成就的。在安特卫普市场上,唱主角戏的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国、法国等国商人,而不是安特卫普本地商人,后者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收稿日期: 2008-10-20

作者简介: 罗翠芳(1973-),女,湖北松滋人,助理研究员,博士。

而当1549年葡萄牙人把香料货栈转移到里斯本,1568年英国把呢绒馆移至汉堡,美洲白银取道热那亚时,安特卫普才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业。工业固然是商业衰退的一种补偿(布罗代尔、阿锐基也持同样的观点),^{[1]115}但是它似乎无法让安特卫普重振昔日雄风。白银海上运输线被切断,导致安特卫普元气大丧,其地位由热那亚取而代之。西欧商业资本纷纷奔赴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地中海。所以,那种因安特卫普繁荣就说16世纪上半期西欧经济重心北移的说法,其实是把历史事实简单化了。16世纪至17世纪初地中海并没有绝对衰落下去。退一步讲,假设安特卫普兴起即是地中海的衰落,但后来西欧商业资本从安特卫普转到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地中海,这表明经济重心又逐渐回移。

实际上,此时经济重心并没有转移。地理大发现后大西洋经济兴起只不过是给西欧传统中心的经济生活添加了一些新内容而已。虽说安特卫普的兴起,使得西欧南北之间一些传统模式首次发生改变,例如意大利诸城市大公司把总部设在安特卫普,管理自己全欧洲的商业与金融业务,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如果外国商人在某个城市或地区居显赫地位,这正表明该城市或该地区落后于这些商人所属国家。这样的例证如:菲利普二世时代在马德里的热那亚银行家;17世纪在莱比锡的荷兰商人;18世纪在里斯本的英国商人;长期旅居布鲁日、安特卫普和巴黎的意大利商人……^{[3]24}因此,意大利在安特卫普设立公司总部并不能说明西欧经济重心转移了。

当时大西洋沿岸经济还没有能力拉动经济重心转移。荷兰、英国等民族国家才刚刚兴起,国内市场的统一才刚起步。当时的大西洋沿岸仍是边缘区域,还没有多大资本能力与传统经济区抗衡。商业资本主义时期,没有实力控制强大的货币资本支付体系,就等于没有启动经济大匣的钥匙。在安特卫普,意大利和德意志商人控制着货币支付体系,西班牙查理五世把白银送到安特卫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南德意志(传统中心)雄厚的商业资本而去的,或者说只有南德意志富格尔家族和意大利银行家这样的大商业资本才有能力向他提供巨额贷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南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大商业资本,也就不会有历史上的“安特卫普时代”。再后来,西班牙向尼德兰运送白银而取道热那亚,不仅仅是从地理因素上考虑而是深知热那亚身后有整个资本雄厚意大利作经济后盾。没有整个意大利的帮助,16世纪下半期热那亚不可能

在金融领域取得领导地位。没有意大利前几个世纪的资本积累(特别是黄金储备)的支持,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战争也就难以为继。西班牙送到热那亚的白银与前来热那亚的欧洲大商业资本相结合,共同创造了热那亚时代。

可以这么说,安特卫普时代和热那亚时代仍然是由西欧传统经济重心区的商业资本把持着的时代。前者是由南德意志商业资本(也有意大利商业资本,不过居其次)操纵,后者是由意大利商业资本(当然也包括南德的商业资本)操纵,这正说明,地理大发现后直至热那亚时代结束,西欧经济重心仍然在传统经济区,而安特卫普的繁荣只不过是西北欧拉动经济重心转移的一种尝试罢了。

二、地中海经济相对衰落:商业资本从商业转向金融

传统说法是近代西欧传统经济重心(地中海)的衰落,主要是因为大西洋经济从外部打击的结果。其实这种说法有点本末倒置(“倒果溯因”)。西欧传统经济重心的衰落与其说是外部打击,还不如说是其内部自动放弃使然,西北欧(在本文中西北欧与大西洋沿岸这两个地理概念互用)只不过抓住了机会,在地中海经济主体放弃的空间中发展了自己。可以这样说,大西洋沿岸经济体起初只是依附于地中海经济活动的一些小角色,只是后来借助了前者的力量,才稳定地发展起来,最终爬到地中海经济主体之上,并使后者从属于自己。如果不是意大利商业资本自己沉迷于金融投机,脱离与贸易生产相关的经营活动从而放弃国际转运贸易主动权,当时西北欧商业资本,或许没有多大能力或者多少机会在与传统经济区商业资本的竞争中胜出,更不用说后来西欧商业资本大规模由南向北流去从而推动了西欧经济重心的北移。

地中海经济主体热那亚、威尼斯为什么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商业势力范围?阿锐基曾给予了理论上的回答。他讲到热那亚资本家时说:获利原则的本身,限制了热那亚资本的自我扩张,从而使它面临自我灭亡的危险^{[4]145}。意大利的衰落(也包括后来荷兰,英国的衰落),其实质是资本的自我扩张与物质扩张(生产与贸易)之间基本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使然。为何如此?不管资本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即不管资本是投向生产、贸易,还是金融,它们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是使资本增殖,实现资本的自身扩

张,即马克思所说的MCM'(M代表资本,C代表商品,M'代表增殖资本)。物质扩张即是贸易、生产的扩大,只不过是资本扩张(资本增殖)的几个手段而已,当生产和贸易扩张到一定阶段,就会使资本的利润下降。在亚当·斯密看来,所有的贸易和生产扩张往往都会迫使利率下降,因而损害它们的主要基础(资本自我扩张)。^{[4]265}按照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精于算计的大商业资本家要把资本的利润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就会自动地使贸易或生产扩张停止,将资本从他们赖以发迹的贸易或生产领域(即从物质扩张领域中)撤出,在金融利润可接受的情况下,他们就从事巨额融资活动,向权力主体提供政治贷款。当资本由物质扩张阶段走向金融扩张阶段,也就意味着资本原在地区即将走向衰弱。因此,“对金融的过度关注和对债务的容忍,显然是经济强国晚期的典型特征,它们预示着经济衰退的到来”。^{[4]371}要解释这一衰弱的根本原因,以马克思的观点最有说服力:财富和利润的最终源泉还是在生产领域,一味地脱离与生产相关领域的地区与国家,长此以往它们的经济基础未免就会显现“空心化”,一旦原先的弱者变得强大,就会把这些先前的强者而现已不堪一击的弱者打败。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期,意大利老牌的大商业资本与大西洋沿岸新兴的商业资本在地中海大舞台上此消彼长的状况,就是这样一条规律的体现。

中世纪以来,地中海西部在传统意义上是热那亚商业势力范围。14世纪时热那亚因与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商业竞争中失败,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地中海西部和伊比利亚半岛,把那里以及大西洋沿岸视为自己商业禁脔之地,不容许他人染指。1457年下半年,英国商人罗伯特·斯特密率领一支商船队南下,到达地中海东部,在那里直接购买香料,由于这一举动有取消热那亚商人在西部香料贸易中的中介地位的危险,因此1458年,热那亚人在马耳他附近袭击了这支商船队,致使其沉没^{[5]281}。从此,英国商人很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汉萨同盟商人虽在北方一度强盛,但也始终没有跨过阿尔卑斯山。

15世纪热那亚在西班牙以及美洲广泛建立了商业据点,频繁地参与伊比利亚半岛内部贸易和大西洋贸易,垄断食盐、羊毛等大宗商品买卖,使得伊比利亚半岛成了“热那亚人的印度群岛”^{[4]99},并在某种程度上说,热那亚人是美洲半个真实的主人。然而当美洲白银大量进入西欧,商业竞争加剧致使利润下降时,热那亚大商业资本家不顾一切地从事金融信贷活动。

并在16世纪下半期“开始把商业贸易与金融贸易服务相分离”^{[6]92}。他们对金融投机全身心投入,为这种魔术般的赌博活动所带来巨大成功所陶醉,而对塞维利亚与美洲的商业活动逐渐失去兴趣。

威尼斯从中世纪以来长期把持着地中海东部,它是西欧与利凡特贸易的主要中介。16世纪,威尼斯曾是西欧工商业的领头羊^{[9]10-11},但到17世纪时,威尼斯在利凡特市场上遭到极大的失败,出现了衰败的现象。17世纪的前十年中,商业活动在威尼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1612年,杜里拉在著作中写道:我们不是缺少资金,我们贵族不愿参加商业活动,如今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财富系于地产与房产上,系于属地与舒适中,富人宁愿把钱投入金融市场中,也不愿投入利凡特的航程中^{[7]12}。由于投入资金不足,威尼斯国际贸易严重下滑,1634年威尼斯布匹在利凡特的市场份额减至26%,而英国却占40%^{[7]32}。

由于大量资本投入到西班牙贷款以及相伴而生的金融活动中,热那亚与威尼斯的商业,米兰与佛罗伦萨的工业都在17世纪以后出现了不同程度地衰落。而“16世纪曾作为辉煌的殖民者和贵金属的控制者的那些伊比利亚国家,在17世纪如此不光彩地下降到仅仅是西北欧加工制品的传送带的地位。”^{[1]248}16世纪末17世纪初地中海地区逐渐走向了衰落之路。

三、西北欧商人商船南下地中海与经济重心北移

16—17世纪西北欧商人商船南下地中海(参见拙文《16、17世纪之交西北欧商人商船南下地中海》,《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加速了地中海经济的衰落过程;而西北欧商人资本则在南下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控制西欧国际转运贸易和国际货币支付体系,最终把西欧经济重心北推向大西洋沿岸。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初,西北欧主要国家英国、荷兰与西班牙帝国之间关系很紧张,西班牙帝国对西北欧这两个主要国家关闭了所辖的一切属地与港口,然而这并未妨碍英荷两国商人商船南下地中海世界。

在地中海东部,从16世纪末英国商人就有组织与威尼斯分吃利凡特贸易利润。1581年,英国商人组建了土耳其公司,1583年组建了威尼斯公司。为了在利凡特更好与威尼斯商人竞争,1592年这两家公司联合成一个大的公司——利凡特公司。1580年5月,土耳

其苏丹正式授予英国在土耳其享有与法国同等的贸易特权,此后英国商人可以直接把商品运到利凡特市场,不再需要威尼斯中介商了,从此与威尼斯争夺利凡特贸易空间。不过此时英国商人在利凡特分享的贸易额还很小,因为在那里英国商人还是以臭名昭著的海盗而出名的。此种现象说明,英国还处在这项“富源贸易”的边缘,并没有把地中海东部变成自己商业势力范围。

西北欧闯入者中第一个控制地中海贸易的不是英格兰,尽管它来得很早,而是后来者荷兰。1595年荷兰商船到达利凡特,在南下的最初几年里,荷兰在利凡特贸易活动能量要比英格兰的小。17世纪前十几年里,荷兰商船加速向地中海东部推进,到达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的阿勒颇等地。法国是西北欧国家中最早在土耳其取得外侨权益法的国家,从威尼斯与土耳其战争一开始(1571年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土耳其在希腊外海进行了勒班陀战争,土耳其大败),法国就大有取代威尼斯之势,在利凡特贸易中较为活跃。

地中海西部是热那亚的传统贸易势力范围,16世纪下半叶,热那亚的大商人逐渐从贸易领域中撤离,投入到金融领域中从而留出不少商业空间。在这一时期,地中海地区出现严重饥荒,大量西北欧商人商船运粮南下,仅1593年到达里窝那的运粮船只有:荷兰12艘,英格兰7艘,佛莱明4艘,挪威2艘……^{[11]188}西北欧商人商船从北方带来了南方所急需的粮食,籍此留在地中海世界里分享越来越多的贸易利润。这是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南北贸易旧有模式(中世纪以来西欧南北贸易模式是:南方商人商船北上,而北方商人商船却很少南下,由南方主导着北方国际贸易)转型的开始,更是西北欧商人商船对地中海世界经济渗透的开始。

16世纪下半期,英国,荷兰等西北欧商人商船虽然在地中海都较为成功地开辟出自己的商业空间。然而它们对地中海贸易的渗透,仅限于地中海雇佣它们的船只,主要贸易仍然还掌控在意大利商人手中^{[12]9}。但是,海上运输是西欧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对意大利诸城邦航运业的渗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取代意大利的开始。

1604年英西和约签定,1609年荷西休战,这为英荷商人商船在地中海的商业扩张迎来了好时光。不过相较而言,这一时期更是荷兰商人资本的黄金时代。荷西休战之后,荷兰商人商船在地中海世界如鱼得水,自由地出入直布罗陀海峡,深入意大利,闯入利凡特。荷兰商人把北方商品运到塞维利亚换取西班牙白银,或者在地中海内部贩运粮食赚取白银,然后前往利凡

特,在那里购得北方地区所需的货物。1611年,荷兰大国民会议任命了驻利凡特各地领事,在地中海东部构筑了一个庞大的非领土性的商业网络。同一年里一份报告指出:在地中海利凡特有许多荷兰商船,^{[13]174-175}1612年荷兰与苏丹签约,荷兰商人在土耳其能享有很多贸易特权,并且在1616年土耳其政府免去了荷兰部分关税,使得其关税不超过3%,而威尼斯在土耳其的关税却为5%。荷兰利凡特贸易越来越兴盛。以叙利亚的阿勒颇港口来说,1614—1616年有30艘荷兰商船达到阿勒颇。1614年,荷兰从阿勒颇出口货物价值总额达150万盾。1620年驻阿勒颇的荷兰领事注意到荷兰商人在阿勒颇的贸易增长很快^{[13]175}。

荷兰商船运价低廉,是西北欧运输船队中的佼佼者。在这一时期,荷兰商人担负了伊比利亚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活动,每年承担了成千上万次运输活动。荷兰商人还插手伊比利亚盐的买卖,他们经常性地到塞图巴尔、阿威罗等地,把那里粗盐运往到欧洲北部去。休战期间,正是因为荷兰商人商船的增多,塞图巴尔盐的出口量增幅很大。里斯本盐商比托,在1615—1618年间曾雇请过200多艘荷兰船来运送粗盐^{[14]44-45},截至1619年,平均每年有200艘荷兰商船进入地中海^{[15]143}。荷兰商船在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来回穿梭,成为17世纪前期欧洲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荷兰商船除了在欧洲南北之间穿梭,在地中海世界内部:伊比利亚—意大利、意大利南北之间更是忙个不停。荷兰商船把西班牙羊毛,盐出口到热那亚,威尼斯以及意大利北部其他港口。而且在这次休战期间,西班牙与热那亚之间的羊毛与粗盐贸易几乎全由荷兰商人来经营。荷兰商人商船在历史上从未像1609—1621期间那样,在地中海世界里显得如此之重要。与此同时,荷兰商船还负责西西里、撒丁尼亚、那不勒斯与巴伦西亚之间粮食贸易运输活动。据佛朗西斯科德·瑞塔玛说:在荷西休战期间,每年经常性往返于伊比利亚与意大利南部港口之间的荷兰商船约有820艘,而且比起荷兰在波罗的海贸易来说,在地中海内做运输的荷兰商船总体上大一些,船只也多一些^{[14]44-45}。为了进一步扩大荷兰在地中海世界的贸易活动,荷兰政府在意大利一些主要港口设立了领事馆。1619年荷兰驻威尼斯大使在给大国民会议的报告中说:在威尼斯海湾里,有许多荷兰商船在那停留,这种情形已持续好长时间了^{[13]175-176}。

1609年荷西休战极大地加快了荷兰在地中海贸易扩张的步伐,加速了威尼斯、热那亚弱化与边缘化

的过程。西北欧尤其是荷兰在欧洲南北的贸易活动,加强了欧洲南北—波罗的海与地中海—经济联系,使之日益融为一体,荷兰逐渐成为欧洲新经济体系中的领导者。正是这一时期,荷英基本上取代了意大利在地中海长久以来的国际中介地位,这是北方控制南方,经济重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重要内容。

1621—1648年间荷西又起冲突,在荷兰商人商船在伊比利亚遭到驱逐之后,英国,汉萨等欧洲西北部其它地区的商人商船抓住大好时机,大量地涌入伊比利亚半岛及其附近海域,占据了原荷兰商人商船在地中海世界留下的空间。除1625—1630年英西战争外,西班牙北部大部分羊毛出口都是由英国船只运到法国北部,佛兰德尔的^{[14]213}。1636—1640年进入法鲁(伊比利亚半岛境内)中,英国船只就占2/3,剩下的1/3是汉萨船只^{[14]288}。在这一时期,汉萨商人中掀起了南下地中海世界淘金的热潮,南下地中海的船只增多。总的算来,1634—1635年,汉萨前往伊比利亚半岛的船只有200多艘^{[14]285}。

同一时期,西欧南北传统贸易——香料贸易出现新的变化。众所周知,中世纪以来西欧香料贸易一直由南方威尼斯、热那亚、葡萄牙等控制,然而到17世纪20—30年代,亚洲香料逐渐由北方荷兰、英国等国控制。这一变化缘于荷兰,英国商人在亚洲垄断了香料生产基地,因而使得欧洲传统香料贸易模式发生改变,其主角由威尼斯,热那亚换成了荷兰,英国。其实除了香料以外,远东与近东其他的商品——香料,宝石等,现在也都改由西北欧国家向包括意大利在内地中海区域出口。传统商品贸易路线的改变标志着西欧南北经济地位在逐渐地改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欧经济重心在逐渐北移。

1648年明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地中海内部的贸易活动几乎全部又由荷兰商人商船来承担。到17世纪中期,荷兰完全控制了地中海世界。地中海是当时西欧贵金属集中区或贵金属市场,控制地中海,就等于控制了西欧国际支付体系,控制了整个西欧世界。

16、17世纪之交,西北欧商人商船南下地中海的过程,实质上是欧洲北方战胜南方,经济重心向北方转移的过程。16世纪威尼斯扼守地中海东部利凡特贸易,热那亚资本家主导地中海西部贸易,并经营塞维利亚对大西洋的贸易,地中海世界是当时欧洲转运贸易中心、货币金融中心,并且是欧洲向海外扩张的前沿阵地。然而在美洲白银大量登陆欧洲之后,热那亚、威尼斯大商人逐渐从商业贸易阵地上撤离出来,纷纷

走上了金融扩张之路,这给了南下的西北欧商人商船极好的发展机会。17世纪前期西北欧商人商船取代热那亚、威尼斯而成为地中海上的“马车夫”,把地中海内部贸易及其海外贸易都逐渐控制在自己手中。到荷英跟随地中海的殖民前辈在大西洋、印度洋站稳脚跟之时,它们完全架空了地中海,改变了欧洲国际贸易航线,把欧洲贸易转运中心、货币金融中心移到大西洋沿岸,并且使那里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前沿阵地。于是,西欧经济重心北移由趋势变为定势。

参考文献:

- [1]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2]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 [3] 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三卷[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4] 阿锐基. 漫长的20世纪: 金钱, 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5] Steven A. Epstein. Genoa & the Genoese 958—1528[M].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 [6] Richard Machenney.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Expansion and Conflict[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 [7] Gigliola Pagano De Divitiis. English Merchants in Seventeenth-Century Italy[M]. University of Calabria, Translated by Stephen Park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8] Christopher Allmand.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II 1415-1560[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 Michael Jones.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I 1300-1415[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布罗代尔.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11] Rich E E, Wilson C H.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2] Thomson J K J. Decline in History: The European Experience[M].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USA, 1998.
- [13] Geoffrey Parker, Smith L M.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 [14]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Hispanic World 1606-1661[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 [15]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 1460-16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ublication, 1977.

责任编辑: 曾凡盛